

徐复观论经学史

二种

徐复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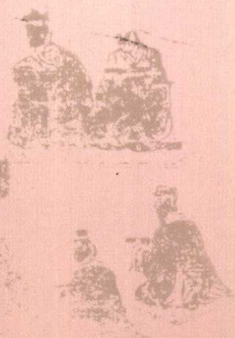
XU FU GUAN LUN JING XUE SHI ER ZHONG

ZHONG GUO JING XUE SHI DE JI CHU

ZHOU GUAN CHENG LI ZHI SHI DAI JI QI

SI XIANG XING GE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上海书店出版社

徐复观论经学史

徐复观 著

三种

- ◆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 ◆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上海书店出版社



李兴盛，汉族，原籍山东费县，1937年11月生于哈尔滨市。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黑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黑龙江大学古籍所客座研究员，《全清诗》编纂筹委会副主任，并为黑龙江地方文献丛书《黑水丛书》主编。1991年被评为研究员，同年初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突出贡献专家，1月批准为省劳动模范。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2月被国家人事部批准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97年8月被评为省直机关科教兴省积极分子。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与香港国际交流出版社、香港炎黄国际出版社、泰国华夏发展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编纂的各种世界性名人录编委会，多次邀其入传。

多年来一直从事东北地方文史之研究。自1980年又致力于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之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论著。专著《东北流人史》一书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及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110万字《中国流人史》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及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另有《边塞诗人吴兆骞》、《黑龙江历代诗词选》（注释、合作）、主编有《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诗文集》、《方拱乾诗集》、《黑水丛书》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各一二百万字不等）。古籍校点有《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黑龙江述略》等。为《词学辞典》副主编，承担该书20万字的撰写工作。还曾参与《黑水丛书》第一至第四卷之整理工作。

其流人研究，在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俄国、德国已产生了影响，有关著述多次被上述地区、国家学者所征引或评介，并曾因此于1997年赴香港珠海大学作中国流人文化学术报告。

目前正在与学界同仁致力于流人史、流人文化这种新的学术流派的创建与《全清诗》的筹编，并在主持《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的编纂。其中主要有《吴兆骞传、年谱暨资料汇编》、《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流寓文化中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趣事》与《黑龙江流寓人士山水与风土诗文选注》等书200余万字。

黑龙江流寓文化与旅游文化丛书

一、流寓文化中黑龙江山水名胜与轶闻遗事

二、诗人吴兆骞系列

（一）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传

（二）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年谱

（三）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吴兆骞资料汇编

三、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

四、流寓文化中黑龙江名人与名胜系列

马忠骏及哈尔滨遁园

五、黑龙江流寓人士传记与诗文资料系列

（一）黑龙江流寓人士传记与诗文资料辑录

（二）黑龙江流寓人士山水与风土诗文选注

目 录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自序	3
先汉经学之形成	6
一、周公及周室之史——经学的发端	6
二、春秋时代经学的发展	8
三、孔子及孔门——经学基础的奠定	12
四、孟子与经学	30
五、荀子——经学形式的发展	37
六、《墨子》中的经学影响	39
七、《庄子》中的经学影响	43
八、《管子》、《韩非子》中的经学影响	45
九、《吕氏春秋》中的经学影响	47
十、六经、六艺的完成	50
西汉经学史	55
一、博士性格的演变	55
(一) 博士成立的背景及其基本性格	55
(二) 博士演变之第二阶段及其性格	59

(三) 博士演变之第三阶段及其性格	62
二、西汉经学的传承	65
(一)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	65
(二) 《易》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67
(三) 《书》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83
(四) 《诗》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105
(五) 《礼》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129
(六) 《春秋》的传承及其传承中的问题	134
(七) 《论语》的传承	148
(八) 《孝经》的传承	150
(九) 环绕《汉书·儒林传》所反映出的若干情况	153
(十) 由古文到古学——刘歆《让太常博士书》	157
三、西汉的经学思想	164
(一) 汉初经学思想	165
(二) 汉中期以后的经学思想	175
附录 有关《春秋左氏传》的补充材料	190
一、《春秋左氏传》若干纠葛的澄清	190
二、左氏“以史传经”的重大意义与成就	196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自序	203
一、引言	210
二、以官制表达政治理想的思想线索	212
三、思想线索在汉代的演进	221
四、思想线索发展的结果——《周官》的成立	228
五、文献线索的考查	238
六、王莽、刘歆制作《周官》历程的探索	248

七、《周官》在文字结构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55
八、《周官》在思想构成中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62
九、《周官》成立的文献背景	267
十、《周官》组织体的形成与管仲	275
十一、读法——以吏为师	284
十二、《周官》中的土田制度与生产观念	286
十三、《周官》中的赋役制度	292
十四、《周官》中的商业与商税	307
十五、《周官》中的刑罚制度	313
十六、《周官》中的教化(教育)思想	325
十七、杂考	341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原书空白页

自序

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中国文化的反省，应当追溯到中国经学的反省，第一步，便须有一部可资凭信的经学史。

经学史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经学的传承，一是经学在各不同时代中所发现、所承认的意义。已有的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已不足以窥见经学在历史中的意义。即以传承而论，因西汉已有门户之争，遂孳演而为传承之误。东汉门户之争愈烈，传承之谬愈增。《后汉书·儒林传》成篇于典籍散乱、学绝道丧之余，其中颇有以影响之谈写成历史事实。《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踵谬承讹，益增附会。及清代今文学家出，他们因除《公羊传》外，更无完整之典籍可承，为伸张门户，争取学术上之独占地位，遂对传统中之所谓“古文”及“古学”，诋诬剝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使后学有除今文学家的偏辞孤义外，更无可读之古典的感觉。皮锡瑞承此末流，写成《经学通论》及《经学历史》两书，逞矫诬臆断之能，立隐逆理之术，廖平、康有为更从而涛张羽翼之，遂使此文化大统纠葛纷扰，引发全面加以否定之局，我常引以为恨。年来在写《两汉思想史》的历程中，随时留意此一问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一文中，对《春秋公羊传》成立的情形及其本来面目作了深入的剖析。在《原史》一文中，对《春秋左氏传》及《谷梁传》也作了同样的工作，尤以对《左氏传》部分说得相当详尽。一九七九年，写成《〈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书，将此争论两千年之久的问题，作了彻底地清理，为治中国古代官制史、思想史及研究古典的人，尽了一番摧陷廓清之劳。凡此也可以

说是我为了写《汉代经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〇年五月初,发现胃部不适,饭食时常患哽噎,精神疲困,但还未检查出是胃癌,我赶忙写成《先汉经学之形成》一文,以先秦的资料证明经学非出于一人一时,而系周初以来,由周室之史,经孔子及孔子后学,作了长期选择、编纂、阐述的努力,以作政治、人生教育之用的。这样便把清代经学家们认为经学成于周公或成于孔子的谬执之见,加以澄清了。这篇文章,曾在同年八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中提出。适在此时,因精神更感不支,进台大医院检查,才知道所得的是胃癌恶症。八月二十二日动了切除手术后,躺在病床上,十分痛苦,自知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老朋友们来看望时,我说:“已活了这么大的年龄,应当死了,可惜我想写的《汉代经学史》,竟没有动笔的机会。”因为这种冷门题目,我不动笔,当代更无人肯动笔的。老友胡秋原先生说:“你可以口述大纲,用录音带录下,由你的学生整理。”实际上,不仅手术后讲话和动笔是同样的困难,而且写这类的文章,必须扣紧资料,资料不是能凭脑筋记得完全的。

今年三月底到美国休士顿小儿帅军处住了两个多月,一面在安德逊癌症中心进行检查,同时每天勉强工作三、四小时,写成《西汉经学史》的初稿。但初稿写成后,发现写得很乱,便在纽泽西女儿均琴家中重写了一次,经过两个月才写成。一篇文章写两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事。二次稿成后,寄给私立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烦他的夫人为我清缮并托薛君为我重看一遍。这次把《先汉经学之形成》略加修改,和此文汇印在一起,暂称为《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由学生书局印行。我是无法写成一部完整的经学史,假定我这里的两篇文章再加上《春秋》三传的考查,能为今后写经学史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出发点,便稍可减轻我在这一方面的责任感了。或者还要补写一篇《东汉经学史》,假定没有时间,则《周官》在东汉所引起的困扰,及《后汉书·儒林传》中所犯若干重大错误,我已在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和本文中加以澄清了，也无碍其为“基础”的意味。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把《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和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的重要部分完全录入，再加以疏通辨析。我知道这是很笨的方法，但也是流弊较少的方法。

这里的两篇文章，前一篇写成于胃癌已经发作之际，后一篇写成于胃癌手术后的疗养之中，文字拙劣、论证谬误的地方更为难免，我恳切希望能得到关心此一问题的学者们的教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序于九龙寓所

校者按：徐复观教授撰选写此序文时，癌细胞已扩散到背部而痛苦不堪，草草成章，思于台大医院治疗后再行重写，但入院后病况更为恶化，无精神再写文章，乃以此文为序言之定稿。

先秦经学之形成

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构成的。它的基本性格，是古代长期政治、社会、人生的经验积累，并经过整理、选择、解释，用作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的。因而自汉以后两千年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骨干。它自身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在形成的历程中，孔子当然处于关键性的地位。但孔子并非形成的开始，也非形成的终结。“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之说，^① 在历史中很难成立。至于说“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斯乃所谓集大成者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之说，^② 尤为鄙陋。以下试就经学由发端以至完成，作概略性的陈述。

一、周公及周室之史——经学的发端

周公是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宗教性很浓厚的文化，转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③

① 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此为清代今文学家的通说。

② 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原道上》。章氏鄙陋的根源之一，系将文化学术的创发与传承，完全安放在统治阶层之上。至清代古文学家言经学，以周公为主，乃由刘歆、王莽曾提倡古学，而又缘饰周公以为夺取政权的手段，将两者傅合而成。实则刘歆们并未排斥博士们的今文学，更未曾将经学中的孔子地位转移到周公。此观于班固本刘歆《七略》以为《汉书·艺文志》而可见。

③ 见《礼记·表记》。

的人文性很浓厚的文化的关键性人物，我在《原史》一文中说明他特别重视历史的教训。^①《左》昭二年，晋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是《易》与鲁《春秋》与周公有关系，而“周公制周礼”^②几乎成为一种常识。周公曾自己作诗、作书，^③作《七月》以陈王业之艰难，作《鸛鸛》以救乱。据《国语·周语》，《时迈》、《棠棣》两诗亦周公所作以明教戒。推而广之，由周室之史所编的诗，都含有教戒的意义。周公作《大诰》是教诰“多邦”“御事”的，作《康诰》、《酒诰》、《梓材》是教诰康叔的，作《洛诰》、《无逸》、《立政》是教诰成王的，作《多士》、《多方》是教诰“商王士”及“四国多方”的，《君奭》是教勉召公奭共驾辅成王的。《召诰》是召公教诰成王的。推而广之，周室之史，编成虞、夏、商诸篇，亦皆所以为教戒之用。《墨子·天志》篇中，“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这段话，是顺着他自己的思想来说的，但由此可以了解，《诗》、《书》的成立，其目的在由义理而来的教戒，并不在后世之所谓史。《荀子·天论》篇：“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周初犹是神话盛行的时代，但将《书》与《周书》及《穆天子传》相较，即可发现在书中所保存的神话最少。这即可证明，为了教戒的目的，在编纂时作了很大的选择。当然，这些被选择、编纂而遗留下来的教材，同时即是历

① 此文收入《两汉思想史》卷三，见页二四〇——二四二。

② 《左》文十八年鲁太史克谓“先君周公制周礼”。

③ 《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皆出自周公。而据《诗》序，《七月》、《鸛鸛》为周公所作。据《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穆王将征犬戎时，谓“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是《时迈》之诗为周公所作。富辰谏襄王将以狄伐郑，引“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棠棣》之诗为周公所作。又芮良夫因厉王说（悦）荣夷公，而叹“王室其将卑乎”的话中，说《周颂》的《思文》及《大雅》的《文王》皆周公所作。

史中的重要资料,并能给历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选择、编纂的动机与目的言,这只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把经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

由上所述,可以把经学的历史追溯到周公,也可以把儒家的历史上推到周公。所以《荀子·儒效》篇,便以周公和孔子为“大儒之效”作证。但经学的成立,是由《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古典再加上乐^①为其基本条件。《诗》、《书》、《礼》皆由史官所纂辑、保管。周公时代,距纂辑成书的时代尚早,《易》尚停留在纯占筮的阶段,且当时似乎尚未流行;《春秋》指的是孔子所修的,不是就周《春秋》、鲁《春秋》而言。所以就整个经学史说,周公尤其是周室之史,可以说是发端的“先河”,距“后海”的时间尚远,何以能说是“集大成”?

二、春秋时代经学的发展

通过《左传》、《国语》看春秋时代,可以说是经学进入到成长的阶段。《左氏传》鲁僖公二十七年,晋“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由此一故事,可以了解:(一)《诗》、《书》、礼、乐,此时已连结成为一组的名称。(二)说《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按指行为而言)之则,《诗》、《书》、礼、乐已与现实生活连结在一起,发挥着教戒的作用。(三)赵衰数闻郤穀之言,而所言者乃《诗》、《书》、礼、乐,是此时的《诗》、《书》、

^① 乐的纪录,应如今日乐谱的性质,乐亡,乃其曲谱之亡。故乐不可能有文字记录的典籍。《乐记》之类,乃言乐的理论与效果,不可称为《乐经》。乐本无经。

礼、乐，已成为贵族间的基本教材。这三点，都是经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把《诗》、《书》、礼、乐连成一组，正反映出这是出于在古代史料中所作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推测是出于周室史官之手。《诗》、《书》的内容，尔后还有增加，也只能推测这是周室之史继续他们的编纂工作。

我在《人性论史·先秦篇》中，曾为春秋时代特设一章，而称之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之出现”。礼、乐、《诗》三者，常作关联性的活动。所以通过《左氏传》以观察春秋时代的文化活动，可以总结为是《诗》、礼、乐三者互相关连的活动。对于《诗》，除赋《诗》以外，引“《诗》云”的最少二十次，^① 引“《诗》曰”的最少七十七次，^② 引“《诗》所谓”者最少五次，^③ 引“故《诗》曰”的最少八次。^④ 当时的乐，主要是以《诗》为主题，此观于《左》襄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请观于周乐”，而乐工所歌者皆为《周南》以下之诗；《国语·鲁语》下鲁叔孙穆聘晋时，述歌诗之所宜，亦皆与乐合在一起，即可证明。对于《书》，引“《书》曰”的最少十次，^⑤ 引“故《书》曰”的最少四次，^⑥ 引“《夏书》曰”的最少十一次，^⑦ 引“故《夏书》曰”的最少三次，^⑧ 引“《商书》曰”的最少四次，^⑨ 引“《商书》所谓恶之易也”一次，^⑩ 引“《仲虺之志》”者一次，^⑪ 引《太誓》者两次，^⑫ 言及《康诰》

① 见开明书局出版《十三经索引》，页一四六。

② 同上，页一四六〇——一四六一。

③ 同上，页一四六一。

④ 同上，页一〇二八。

⑤ 同上，页一一三九——一一四〇。

⑥⑧ 同上，页一〇二四。

⑦ 同上，页一一一二。

⑨ 同上，页一一九。

⑩ 《左》庄公十四年。

⑪ 《左》襄公三十年。

⑫ 《左》襄公三十一年及《左》昭公二十四年。

及蔡仲“命书”者各一次。^① 有些是先引《诗》而接着引《书》，有些是先引《书》而接着引《诗》，即是《诗》、《书》同时并引。^② 这种引用，常在两相对答之间，由此可知当时贵族对《诗》、《书》的熟练。我所根据的索引，非常疏略，只有漏列而无溢出。我只想借此反映出当时《诗》、《书》所发生作用的概略面影，较汉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周当然已有占筮，并且已将卦辞、爻辞编纂在一起。但除《洪范》中曾卜、筮并提外，在文物中并不多见，甚至还没有发现。据《左氏传》，春秋时代，由鲁庄公十二年追记陈敬仲出生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起，大约一共记载十九次有关《周易》的事情。^③ 以《周易》为筮，除僖十五年秦系由卜徒父执行外，余皆属于史的职守。因史的文化水准较卜人为高，故史对卦辞的解释，已较卜人对卜兆的解释，含有较多的合理性。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不仅由史所主管，而且也成为贤士大夫教养之资。《左》昭十二年，卫“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按指爻的六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非史职而曾学《易》，因而对《易》作了合理的解释，则其他士大夫中亦必有学《易》的，因而推进了《易》的理论水准。所以《左》宣公十二年，晋知庄子引《周易》师卦的“师出以律，否臧凶”，而断“此师（晋师）殆哉”，这种判断是根据《周易》中的合理性所作的判断。而《左》襄九年记鲁穆姜对随卦“元亨利贞，无咎”的解释，被后来乾《文言》作者

① 《左》定公四年。

② 例如，《左》襄公二十五年卫太叔文子“《书》曰……《诗》曰……”，《左》昭六年晋叔向“《诗》曰……《书》曰……”。

③ 《左》庄公十二年、闵公元年二年、僖公十五年秦、晋各有筮事。僖公十五年、二十五年，宣公六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昭公元年、五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哀公九年。